专家简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李文海　社会历史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一浪接着一浪，发展着，前进着。每个不断更迭和相互交替着的时代，又都有自己特定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使自己与其他时代区别开来。

18世纪的历史，由于其特殊重要的历史内容，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把这一百年从延绵不断的历史岁月中特别提出来，作为一个专门的历史范畴加以深入研究，并且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18世纪学”。

戴逸同志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的“导言”中指出：“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18世纪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不论从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来说，都是如此。

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着眼，18世纪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的第三次伟大的革命性变革——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个世纪。在这一百年间，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或者正在发生、或者正在酝酿着空前急剧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20世纪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向，甚至今天世界格局中的某些特征，在18世纪就已经大体确定下来，或至少播下了种子。

对中国而言，18世纪同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时，正是清王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发达；在这一百年间，中国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文化、思想、艺术等许多方面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经过漫长岁月积淀而成的中国国情，也大体在这个时期奠定了基础。但是，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丧失了许多机遇，以至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开始从先进逐渐走向衰落。

深入探讨、揭示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和形成过程，追本溯源，不得不需要回到18世纪。而把18世纪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更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加深对当代中国国情的认识和理解，并为探索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提供坚实的历史和理论依据。(作者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

龚书铎　中国史学有“通古今之变”的传统。所谓“通古今之变”，关键在于一个“通”字。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史家要有“通识”。研究历史可以选取某一事件、某一朝代、某一人物作为对象，但是客观历史本身却是纵向和横向地发展着，它是割不断的。专门的微观的研究无疑不可或缺，然而缺少通识，没有纵通、横通的把握，专门的微观的研究是难以把问题说明白，难以有更深的见解。在中国史的研究中，相对而言，纵通比横通的情况要好些；但也不尽如人意。如一朝清史，研究鸦片战争以后的就不大注意以前的，反之亦然。至于横通，问题就更突出，长期以来中国史、世界史都是分隔研究的。这很不利于史学的发展。有鉴于此，戴逸教授选取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作为研究的对象。在他的主持下，撰著、出版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九卷二百数十万字的巨著。该书焦点虽在18世纪，但“不仅限于18世纪，力求了解17世纪的来龙与19世纪的去脉；也不仅限于中国，力求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比较”。不论对18世纪这个历史发展重要世纪的选择，还是研究视野、方法的开拓，都很有意义。

吴于廑教授在《世界历史全局与十五、十六世纪》论文中认为：“从十五、十六世纪开端的世界历史进入整体发展的这一过程中东西两个比较先进力量的较量，这时到了决定性的阶段。从

这时期起，西方决定性地树立了优势，东方从此进入了相当长时期的受动局面。”这是很有启发性的。戴逸教授主编的《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在时序上正好与吴先生研究的课题相承接，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该书分类撰述。首卷为导论，戴逸教授自己撰写，可谓是全书的指导思想和纲要。其余八卷，内容全面、丰富，这里不可能都谈到，只举思想文化方面为例。这一卷大体上反映了历经康雍乾三朝百年间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脉络和主要内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上述的问题都与同时期的西方文化作了比较研究，加以具体分析和论述。如认为 18 世纪一百年间，“中国的学术文化进入总结集成的阶段，以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和传统文化的总结著称；欧洲则是一个开创的时代，以新思想的建树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特色。”而以《四库全书》和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作为东西文化上述差异的集中体现，给予比较，既有可比性，也能够说明问题。如认为《四库全书》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统治工具，着眼于汇编，重因袭，沉湎于历史；而《百科全书》则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号角，用力于撰写，贵创造，着眼于现实。这些比较、分析很有见地，可以使人们认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主要点，而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差距”，而由此也反映出东西方社会的差距，西方的优势和东方的不利地位，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并不偶然。(作者龚书铎：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岂之　　多年前戴逸教授提倡研究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为此他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这个课题的重要性，并着手主编《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九卷本史学专著。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到开花结果的时候。我很赞同戴逸教授在此课题上的基本观点，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可为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架起一座桥梁，是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从中国思想文化角度看 18 世纪中国与世界，就会发现 18 世纪中国确实是从古代到近代的一个过渡。旧的在这个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总结，而新的正在探索中。如果说 17 世纪的中国是“天崩地解”的时代；19 世纪的中国是“忧患历史”的开端，那么，18 世纪的中国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这和未喷发的火山一样，外表的平静不能掩盖内部岩浆的激烈活动。

18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激烈活动”主要表现在“总结”与“创新”上，虽然是开端，然而是有历史意义的开端。这种总结与创新表现于：

中国传统的经学研究方法发展至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成为成就极高、极为规范化的考据学；这是对古代经学研究的总结。宋、明理学发展到清朝乾、嘉时期，已经走到它的尽头，需要加以总结，并另辟蹊径。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又有《答彭进士允初书》，是反驳彭允初对此二书的批评。这些反映了理学总结和思想创新的学术方向。又如汪中对《大学》的怀疑，他在《述学·补疑》中有《大学平议》一篇，从三个方面论证《大学》并非是至高无上的经典。他试图从新的角度去研究先秦诸子思想。还有焦循，试图对《周易》的研究进行总结，并直接继承梅文鼎、戴震的研究，从数理角度开辟易学研究的途径。还有阮元对汉学的总结，不仅在经籍的辑录与汇刻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对汉学方法以及学风的总结，同时具有创新的意义。

总之，18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带有明显的总结与创新的特色。后来的事实表明，思想文化的创新只在“中学”里寻找答案，那是很难有丰硕成果的。历经 19 世纪，直到 20 世纪初，中国的学人认识到“中学”与“西学”的结合，特别是从“西学”中寻求哲学和方法论的启示，并将此运用于“中学”的研究中，才能使思想文化研究出现新面貌，正如王国维所说，“中学”与“西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国学丛刊序》）。(作者张岂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胡绳武　　戴逸同志主编的《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这部九卷本的史学专著，改变了过去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分开来进行研究的习惯做法，选择了 18 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焦点虽在 18 世纪的中国，但又不限于中国，而是把中国放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下，与西方各国从各个

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这就不仅在史书的体例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通过对 18 世纪的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比较研究，破解了近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这一巨大历史课题。

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和保守僵化的政策何以长期通行无阻？中国何以在封建社会后期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课题困惑着许多学者，一直未得到科学的论证和有力的回答。

历史上任何重要的历史现象，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也决不会无缘无故地不发生。西欧各国在中世纪后所以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在封建社会后期之所以未能进入资本主义，其各自深层次原因，则必须到各自长期历史发展和整个社会结构中去寻找。这套丛书选定 18 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应该说，找准了破解这一课题最适合的切入点。

认真研究 18 世纪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就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它们究竟是由那些社会因素，经过长时期的汇聚、成长、互相作用，终于进入资本主义的。弄清楚这些，自然也有助于我们说清楚中国在封建社会后期为什么没有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认真研究 18 世纪的中国，自然更是破解这一课题必不可少的。18 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清代的“康乾盛世”。当时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均有许多成绩，多超过前代，这是就历史的纵向比较而言。但是，中国并非独立存在，如果把它放到当时世界范围中和正在加速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那就不免黯然失色。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暮年，两者的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性质不同，已不可同日而语。

就 18 世纪的整个形势而言，闭塞已久的中国正极其需要开通渠道，了解世界状况，放松思想压制，以迎接行将到来的世界性的挑战。但当时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无力克服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上国观念、闭关政策、文化专制主义，和以不变应万变的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的进步，窒息了社会蓬勃发展的生机。世界潮流在奔腾向前，而中国的统治者却如在梦中，毫无觉察，未能采取开放和开明的政策，失去了及时地了解和跟上世界潮流的机会。到了鸦片战争终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侵略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戴逸同志所主编的这部史学巨著，之所以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我觉得是由于它做到了从历史事实出发，掌握并运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的科学论断的指引下，吸收了已有的中外研究成果，论证并描述了 18 世纪是中国开始衰落与落后的关键性的一百年。同时，既从总体，又分别从各个方面对 18 世纪的中国和西方各主要国家进行分析性的比较研究，有意识地着重剖析西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因素之所以能够交互作用进入资本主义，而 18 世纪的中国之所以缺少这些条件。这样，它就有力地回答了近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这一巨大的历史课题。(作者胡绳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

王庆成　病中读到戴逸教授主编的《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精神为之一振。18 世纪中国正值清朝的盛世，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而且时间长达百年以上，远为文景与贞观之治所不及。强盛的 18 世纪的中国可能被很多人看作是中国人的骄傲和光荣，但除此之外，历史学家还会有更多的感受。

戴逸教授指出，18 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主要的西方国家发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变革，而貌似辉煌的中国，到 19 世纪却衰落了，不是一般的盛衰循环，而是在西方世界的进迫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19 世纪中国不是仅仅研究 18 世纪中国就能理解的；还需要联系当时的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来研究中国，才可能对 19 世纪以及以后的中国之命运有更深切的了解。这部《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 18 世纪清代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更由于把中国放在当时的世界坐标系中加以考察，因而使读者认识中国的真实地位和状态，认识以后中国的历史命运之由来。我觉得这是本书的理论性和基本学术贡献之所在。戴逸教授自己撰写的导论卷是全书的指导性纲要，尤其集中体现了这种贡献。

18 世纪的中国与欧洲曾有某些程度的联系。但基本上，互相间很少了解。18 世纪中外交流如有顺利一些的发展，是否会改变 19 世纪中国的命运？那不是历史研究者应有的想象。中国是否改变和如何改变，根基在于它的自身。这部九卷本巨著的社会卷研究了当时的人口和由人口剧涨引发的社会诸问题以及统治者的认识，研究了当时的社会组织如家庭、家族和里社坊厢保甲以及行业组织，研究了秘密会社等非常态性组织，研究了士绅作为社会领导阶层的特性和权力。这些篇章对清史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同时，作者又就这些问题与世界的情况进行比较，阐述它们的特性和共性，予读者以不少启发。如作者研究 18 世纪中国基本的家庭组织形式，更从经济与家庭的关联等方面与进入或接近产业化社会的国家的家庭作比较，提出主要的差异在于，后者“家庭生产功能（仅指物的生产）的消失”，“纯化为消费和生产下一代的生活单位”；而这“对 18 世纪中国的家庭来说，是太遥远的事”。又如作者研究 18 世纪中国的“士绅”，比较他们与英国“绅士”之不同，指出前者“缺乏政治经济独立性，缺乏反对专制制度的内在素质，决定了其与皇权共生死的社会命运”；而后者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较强的独立性，王权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他们，“这为以后王权联合绅士反对贵族和绅士反对王权、争取政治权利奠定了基础”。的确如此。在社会结构方面，中西之间有许多名同实异的事物。中国国情特点的深入概括，需要史学与理论的结合研究，我相信，这部《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为此作出了一个范例。（作者王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张椿年　戴逸教授主编的《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是一部精品力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8 世纪的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法国已故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直到 18 世纪末，中国在亚洲仍是一个“稳固、强盛的经济世界”，然而正是在 18 世纪，中国由康雍乾盛世开始走向衰败，与此同时，西方世界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独立战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法国大革命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传播于全世界，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则标志了以农业为优势的经济向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过渡。

18 世纪是中国和西方历史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分水岭，它已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以 18 世纪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在这个世纪开始衰微的原因，总结其历史经验，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本书虽以研究中国为重点，但又不孤立地进行研究，而是把它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背景中，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加以考察、对比和分析。但本书并不限于横向的比较，为了更深刻地认识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常跨越 18 世纪的时段，从纵向上说明历史的发展过程。注意纵横结合，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本书资料丰富翔实，观点正确，不仅全面深入地分析了 18 世纪中国的实际，还说明了中国与西方历史发展的异同，有利深化世界史的研究。

本书在对比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 18 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阐明了中国的封建制度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这是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1985 年，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虽曾讨论了这个问题，但远未达到本书的水平。因此，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中国史学，也是对国际史学的重要贡献。（作者张椿年：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

罗　明　戴逸教授主编的《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以九卷的巨大篇幅，截取了 18 世纪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范围之中进行比较研究，改变了过去研究中国历史“不问外事”的状态，扩大了视野，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政治卷》对中国 18 世纪的政治状况，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特别是对封建君主极端专制政体的强化和完备的过程，条分缕析，论据充分，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中国封建社会自秦始皇以后，一直实行君主专制。如何处理好君权与相权、监察与行

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将帅的监控、宗室诸王的处置、宦官的管理、决策的正常运转、政令的畅通无阻，这些都是保证君主高度集权所必须解决的难题。本书对18世纪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为强化极端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各项措施，都有详尽的分析。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找到制约各种力量的平衡点，把专制政体推到了极致，消除了历史上影响君主专制下政治稳定的各种隐患，建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的封建大帝国。这对于国土面积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三亿、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是有积极意义的。到了19世纪，欧洲侵略势力对中国发动进攻时，它所面对的不是分散的部落，不是各自为政的土邦，而是一个土广民众、政令统一的庞然大物。这无疑增强了中国抵抗侵略的力量，延长了抵抗的时间。这也算是康、雍、乾三帝的一个贡献吧。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18世纪中国植根于旧经济社会结构的专制制度的强化，是对旧秩序的维护，因而缺乏生气，因循保守，以至于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同在18世纪，欧洲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它扫除了欧洲大陆的旧制度，使欧洲进入了近代，在北美，经过独立战争，诞生了美利坚合众国，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本书第四章对18世纪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产生的背景，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及其局限性，都有比较全面的、公允的评论。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世纪，君主专制也已消亡，但它的影响似乎并未完全消失，在一些方面，在某个时段，仍依稀可辨。传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列宁对这种现象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在研讨18世纪中国政治史时，这一点似乎也应引起人们的思考。（作者罗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

马大正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从学术意义而言，填补了当今18世纪清代社会研究的空白；从现实意义而言，它深刻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由最后一个太平辉煌——康雍乾盛世滑向衰世凄凉的历史轨迹，警示近代中国被动挨打局面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我以为，《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将以其全和深进入今日史坛力作之林。

言其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依据18世纪清代社会的演进历程分列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农民、思想文化、边疆民族、对外关系，以及统领全局的导言，共9卷，形成了立体研究的视角，展示了18世纪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将康雍乾太平辉煌一展无遗的同时，充分揭示了太和蒸蒸华衣下危机四伏的征兆和迹象。作者还将研究的视野扩大至世界，即着力从世界发展的全局来观察18世纪的中国，由此深切指出，18世纪中国正处于中西力量对比位移的质变前夜。如《导言卷》指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坐标系中，才能认识中国的真实地位和状态，而世界中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抛开了中国史，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世界史"。18世纪的世界在变，飞速的变，而18世纪的中国却仍沉溺于东方大国美梦的自我陶醉之中。因此，18世纪确是考察中西方历史嬗变轨迹，解开许多历史之结的绝佳视界。

言其深。《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作者秉承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传统，寻绎"使人们深刻认识通常所称具有'中国特色'，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国的特殊国情"（《社会卷》第3页）。同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各卷充分利用"比较研究"这一解剖刀。《边疆民族卷》将18世纪清政府的边疆经略与俄、美两国同时期的边疆扩张进行比较，从大量历史事实的分析中得出了它们之间实有本质区别的实质。该卷还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有清一代边疆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在缜密梳理清政府边疆政策内容和肯定其历史功绩同时，尝试从社会控制论理论出发，指出清代边疆政策追求以安定为社会控制目标，但求稳有余，而忽视发展的一面，导致一旦中央政府控制力衰微，在帝国主义侵略下边疆地区自身抵御外力机制和实力的下降，由此推动了清代边疆政策研究的深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是一部集思广益、众志成城的学术力作，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追求。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德国学者施洛巴赫教授誉称该书出版"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实不为过。（作者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